

# 国外多元视野“幸福”观研析\*

丘海雄 李 敢

提要:幸福研究日益受到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关注。理论界对幸福研究的认知存在着筑舍道傍、众说纷纭的一面,基于不同学科概念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方法体系。本文着力于分析不同学科中的“幸福”特性,并尝试对幸福的层级性和复杂性(如个体幸福感与国民幸福指数的差异)予以区别,进而提出自己对发展趋势变迁的认知,即倡导从既有专注于经济域的国民经济帐户体系<sup>①</sup>时代走向兼顾社会域的“国民幸福帐户”体系时代。

关键词:幸福 国民经济帐户体系 国民幸福帐户

## 一、幸福研究再兴起的时代背景

幸福及对幸福的探讨是一个千古话题。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与管理的进步大大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为了追求无止境的经济增长,不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可谓不遗余力,尤其是自20世纪

---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从经济经营者到社会管理者——地方政府行动逻辑的转型研究”(基金编号:10YJA840033)、中山大学三期“211”项目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985”项目的经费资助。拙文在修改过程中,受益于经济学家黄有光先生的谆谆指导。此外,美国杜克大学的丘晴与同门刘溯源、黄嘉文、刘米娜等在资料素材的提供与梳理方面也有所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① 国民经济(收入)核算体系,又称“国民经济帐户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是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依据,并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核算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SNA认为,创造物质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劳务活动均从属于价值活动创造。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和英国著名国民经济核算专家斯通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1953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正式对外公布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该体系很快通行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此核算方法。SNA体系包含五个部分,即国民生产净值(Net national product,简称NNP)、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简称NI)、个人收入(Personal income,简称PI)、个人可支配收入(Personal disposable income,简称PDI)、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其中,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五大总量指标中的核心指标。

50年代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公布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各国纷纷接受和拥趸,GNP与GDP指标体系成为衡量经济总量或社会福利的最重要标尺,且为世界各国瞩目,以致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对GDP的推崇也几近成为“普世性”的时尚。

毋庸置疑,GDP体系有其合理性与进步性。然而,随着发展实践历程的变迁流转,GDP体系的负面性日益彰显,且直接冲击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与平衡,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情景也令世人逐渐重视其中的问题所在,并开始尝试寻求解决的路径。除了政策制定者们之外,在学术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随之开始研讨,以求获得更好的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衡量及核算之间的新标尺,以求发展出足以补充GDP体系,并作为评价社会福利与发展的新的指标体系。于是,对幸福的探寻开始日益显现其重要性。

幸福研究在西方的再度兴起肇始于20世纪中期之后,当时西方社会总体上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物质成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一时间,人们沉迷于物质享受,并误以为物质成功就是人生所在。不过,人们很快发现,伴随恢弘经济建设成就而来的却是整个社会成员普遍性的失落寡欢,对幸福和人文关怀的呼声也即应声而起。在当时的社会科学界,与幸福探讨相关的研究首先是“生活质量”,其始自于由加尔布雷斯(1965:16)所撰写《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中提出的对“公共污秽”的反思,个中已暗含有对将GDP/GNP及其增长率作为衡量社会幸福与进步指标的质疑。之后,在某些文献中,“生活质量”与“幸福”这两个术语几乎是等同的。

进入21世纪,西方的幸福研究日益呈现多元综合态势,而2008年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则将幸福研究推向高潮,危机令各国民众普遍意识到,既有的惟GDP的发展路径中存在着不少隐患,因为危机使得世界处于“战后一个最差的金融、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期”,环境危机也迫在眉睫。在此情形下,因对既有GDP衡量体系的不满,法国总统萨科齐试图建立起一个衡量社会进步的综合指标,他在2008年召集组建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简称CMEPSP),也称“斯蒂格利

茨·森·菲图西委员会”<sup>①</sup>，该委员会在2009年发布了“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委员会报告”(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报告提出，经济发展测量体系变更应实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转变，即应在关涉社会未来福祉与进步测量方面有所思考与回应，因为进步并不仅仅意味财富的创造或革新，同时还意味着苦难的减少与幸福的增加，财富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物本），财富只是（人本）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幸福除了（基于收入或财富“福利”因素之外，更多涉及非收入因素（例如教育、职业发展、健康状况、家庭关系等），该报告还进一步详细论述了关于幸福测定的8维度与12条建议。幸福<sup>②</sup>议题也随之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理论热点。

## 二、多元学科视野下“幸福”观比照

囿于“幸福学”研究整体尚处于新生时期，当前国际学界关于“幸福”的界定与影响因素暨测量方面的分析可谓见仁见智，甚至有“如蝮如螭，如沸如羹”之貌。本文以学科分野差异为出发点对相关学科的理论观点做一梳理。

- 
- ① 委员会中的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巴黎政治学院( 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教授让-保罗·费图西( Jean-Paul Fitoussi) 担任联席协调人。
- ② 幸福研究中的“幸福”一词在国际学界的英文文献中一般有5个对应词，即“well-being、happiness、welfare、hedonia、eudemonia”，后两个一般出现在哲学、伦理学文献中。本研究注意到，对于“幸福”一词，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如福利经济学，其对应的英文一般为“well-being”或者“welfare”(福利)，而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如行为经济学和快乐经济学，幸福一词对应的英文一般为“happiness”(也有用“hedonics”的)。依据黄有光( Ng, 2006)的观点，“well-being”一般译为“幸福”，“welfare”作为主观感受时也可以译为“幸福”或“福祉”，“happiness”一般译为“快乐”，只是“幸福”与“福祉”是比较正式的用法，通常指较长时期的快乐。除此之外，三者的语意基本是一样的。同时，心理学权威迪纳( Diener et al., 1999)指出，在西方学界，学者们倾向将主观幸福(SWB)等同于幸福(Well-being)，用以评价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生活质量。当然，同一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有可能混用这几个词语，例如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卡罗尔·格雷厄姆( Graham et al., 2004)在他的《快乐有什么酬劳？——基于俄罗斯面板数据的探析》一文中，将“快乐”(happiness)与“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 SWB)视为同义词。兰卡斯特大学的约翰·阿尼尔( O'Neill 2006)在其文章《可持续性、幸福和消费：享乐论方法的局限性》中将“subjective well-being”与“subjective welfare”视为同义词。

### (一) 经济学“效用”之中显争鸣

实际上,在经济学界,自边沁与杰文斯提出广义效用观到最早提出“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的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效用观已经发生重大更变,即由起先容纳物质追求与精神诉求的体验效用观(experienced utility)逐渐滑向“最大福利”的决策效用观(decision utility),效用的外延呈现缩减化趋势(Kahneman, 1997)。在这种情形下,效用已经成为失去既有道德内涵而只是用于定义偏好的数字,价值判断被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而代之以实证研究。例如,在“主流”新福利学学者萨缪尔森及其继承者心目中,增加收入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用,幸福、收入、效用几乎是正比关系,而效用又主要体现于(显示)偏好。此后的经济学界,幸福效用论的后继研究者也基本沿着“幸福——效用——显示偏好”的路径开展研究,只是个中对于偏好(效用)的内涵与外延、幅度、方式等有了进一步的细化讨论。例如,在理论层面,卡罗尔·格雷厄姆(Graham, 2005a)认为,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应采用更宽广的福利与效用观,他指出了萨缪尔森显示偏好理论的局限性(如不能很好地测量或顾及到不平等、通货膨胀与失业乃至环境退化等方面的福利效应、某特定政策的福利效应,以及个人无力更变的制度安排等因素),主张将表达偏好加以丰富,同时采取互存效用、程序效用等扩大后的效用论。

在幸福的效用测量方面,从旧福利经济学时代的基数论到新福利经济学时代的序数论,两种效用观一直争执不下。瓦尔拉斯与庇古均主张基数效用论,该效用论是以效用的可测量和可比较为前提的。而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新福利经济学学者,如L. C. 罗宾斯、N. 卡尔多、J. R. 希克斯、A. P. 勒纳等认为,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不能用基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他们主张效用序数论,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和黄有光等一批从事幸福研究的经济学学者则开始力撑效用基数论,只是在操作化方面,森(Sen, 1995)主张的是“可行能力”效用观,而黄有光(Ng, 1996)则主张以“最小可感知快乐(苦痛)量”为单位对生活经历

予以基数赋值。

在幸福效用论中还有一支较为“独特”但可纳入“基数论”的效用观,即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体验效用”论,其又可以分为即刻效用和记忆效用,以“快乐与痛苦体验效用的可测度性”证明了客观幸福的存在(Kahneman 2000)。至于“体验效用”的测量,其依据的是卡尼曼与他人合作开发的“日重构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简称 DRM)(Kahneman, 2004b)。DRM 具有明显的实验心理学研究色彩,把人的行为置于可重复观测的实验中,专注于对精确瞬间的情感状态的及时测度,是对契克森特米海伊与拉尔森(Larson & Csikszentmihalyi, 1983; Csikszentmihalyi & Larson, 1987)等人开发的“体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简称 ESM)的改造,实际是对“基于当期的”和“基于回忆的”体验效用两分法的具体运用。利用专门为减少回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他们一天来的活动和体验,并评估人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和安排。DRM 注重对当下的体验价值及其与时间使用相结合在幸福测度中的功用(如特定情形下或时间内的日常生活体验)。在操作上,DRM 一般是根据一定问题架构来引导被测试者以细节描述方式,对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进行回忆与再现(如通过被试者填写前一日的汇总事件,并报告其中每个事件中的感觉),并对这种状态进行实时体验测度与评估。

至于为主流经济学中所力争的决策效用与为行为经济学中所力撑的体验效用之间的孰是孰非,或正如与卡尼曼同属于行为经济学阵营、心理帐户的提出者理查德·塞勒(Thaler, 1999)所言,基于稀缺的决策效用归根结底是以基于快乐的体验效用为目的的。概言之,在经济学界,在幸福研究的效用测度方面,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各有“阵地”,可谓不分轩輊,各有千秋。

## (二) 心理学“天定”之命可调适

对心理学界而言,幸福研究乃属其当行本色之责。不同于经济学对影响幸福外在性因子的关注,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大多是围绕影响幸福的先天性与内在性影响因子展开的,例如基因遗传、人格特质、体质体格等,其中也包括对诸如教育、年龄、性别等社会人口特质变量的计量统计分析运用。

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又可以分为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简称 SWB<sup>①</sup>) 与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简称 PWB) 两大分支。前者一般指的是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进行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 具有主观性、稳定性与整体性等特征; 后者更多强调一种人潜能的自我展现, 包含自主性、个人成长等 6 个维度( Ryff, 1989)。在一定意义上, 这两类分支研究均可视作对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的承继与发扬。只是心理学在对幸福进行解释的诸种经典理论中, 无论是期望水平论( Diener, 1995), 还是设定值理论( Easterlin, 2003), 抑或是目标论与适应论( Diener, et al., 1999) 等均倾向于认为, 对于社会幸福水平的提升而言, 任何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努力都将是事倍功半的作为。幸福与否几乎是一种“天定”之命, 幸福测量应突出“人格、情感与认知”的功用, 应更多依赖于从微观层面对个体当前感知去校正调适, 因为个体“临界点”、“期望值”与“适应性”等均直接影响到人们幸福感获知与评判。

### (三) 政治学: 民主参与不可少

政治学对幸福的研究强调民主化程度和公民参与度与幸福快乐有直接关联性, 譬如由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Ronald F. Inglehart) 发起的“世界价值观调查”(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简称 WVS) 项目、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经济学实证研究所与卡托研究院的幸福与公共政策研究都是这方面的代表。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实证研究所的弗雷和斯塔特勒( Frey & Stutzer, 2002a: 12-15) 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 政治自由( 个人参与政治的可能性)、经济自由( 个人参与市场自由交换的机会), 以及个人自由( 私人生活的自由) 与幸福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 他们认为, 分权制政府建制对幸福存在显著正向作用, 人们参与直接民主的可能性与幸福之间有着显著且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对此, 其他一些相关实证研究也予以了佐证。

在幸福影响因子分析方面, 民主这一因素比其他人口学和经济因素的解释力更强。因为民主建制有助于塑造出一个向上流动机会较多、社会宽容度较高的社会, 而此二者均有助于幸福的提升。有研究表

① 关于 SWB 的中译名, 国内学界不曾有共识, 有的主张译为“主观幸福感”( 姜伶俐, 2010), 有的主张译为“主观幸福”( 方纲、风笑天, 2009) 等等。

明,在一个向上流动机会较多的国家,人们对不平等的容忍度比较宽容,即便暂时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仍然不会感觉不幸福(Graham et al., 2004)。易言之,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宽容度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Inglehart et al., 2008)。

#### (四) 社会学“网络”之中有真情

社会学对于幸福的研究则偏向于强调运用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视角,突出亲情、友情、信仰之力、邻里守望之情等社会支持、社会参与的功用。就幸福影响因素而言,社会学高度认可心理学的人格特质与经济学的经济变量对幸福影响的论说,但同时还认为,幸福影响因素研究不应局限于此,因为社会支持、社会参与、价值观、信任与信仰<sup>①</sup>等也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首先,以社交生活为例,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积极心理学之父赛利格曼(2010: 22)的研究表明,10%最幸福的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具有丰富的社交生活,他们区别于一般人和不幸福人的一个标志是愿意与他人分享生活,而不是一个人独处。其他社会学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在婚姻、家庭、社群、宗教团体中所获得的幸福感会比单一的个体所获得的幸福感多很多,这说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对幸福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至于社会关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人们幸福的实证研究,伦敦大学的庞德涉维(Powdthavee, 2007)依据英国家庭面板调查数据(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通过“影子定价方法”(shadow pricing method)和社会资本理论的使用发现,由(亲朋邻居)良性社会互动所造就的社会关系价值,在经济意义上可以折算为一年85000英镑(这个数字是家庭人均实际收入9800英镑的9倍多)的产出。这也提示政府应重新考虑在经济社会政策制定中只图求经济增长的作为,应同时关注有关政策中的无形和有形成本,从而更有效地分配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民众的幸福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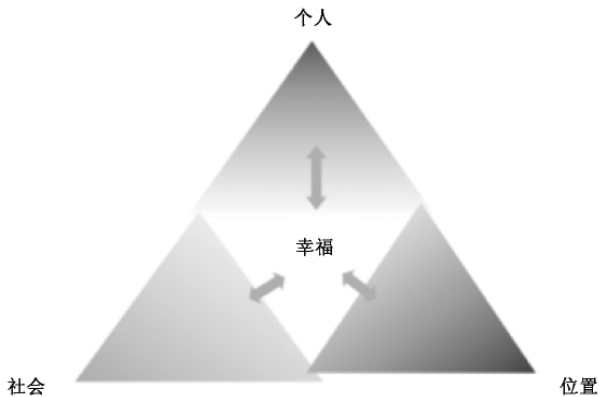
其次,以社区建设对民众幸福度的影响为例,英国“幸福行动”(Action for happiness)组织有大量著述论证了邻里关系对于幸福社区

---

① 信仰,不一定是宗教的。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信仰可以指有利于“心灵和精神的合作”、促进感情统一的因素,而不论其是否涉及超自然神灵崇拜。正义、公平、善良、勇敢等都可以是信仰,在与作者的通信中,黄有光教授对此也有阐述。

构建有着重大意义。假定社区层次的幸福构建可以表述为一个“公式”(Young Foundation 2010b) 这个公式 = 亲仁善邻( neighbourliness) + 社区培力( community empowerment)。公式中前一部分不妨理解为利他的社会支持,后一部分可以理解为公民的社会参与。亲仁善邻和社区培力可以在三个方面提升居民幸福,即为居民提供更多机会以影响事关他们所居住社区的决策,促进邻里间定期往来,以及提升居民掌控当地发展运行情形的信心。

第三,以“幸福行动”的“温暖”( the Wellbeing and Resilience Measure,简称 WARM) 研究为例,WARM 强调的是民众在社区层次上的生活体验,强调街区邻里既作为物理空间,也作为社会空间被人们体验并建构着。WARM 的意义凸显于生活在邻近区人们的人际交往及地方身份创建,促进地理认同的物理性边界生成,并对地方的特别定则、地方神话和故事传说、与地方领导人晤谈机会、较强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契约、仪式和节奏都有强调,同时,可分享的信仰体系也是其中的重要元素。WARM 的幸福构建如图 1 所示。



资料来源:整理自 Young Foundation 2010a。

图 1 WARM 的幸福架构

图 1 中的“社会”层面包括家庭与朋友关系、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等。其内容又可以分为主客观两个向度。客观向度的测度指的是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等指标;主观向度的测度指的是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亲情体验测量)、认为有他人和自己一同去讨



论问题或者可以求助人群的百分比、相信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可以相处融洽人群的百分比,以及认为与邻里关系融洽人群的百分比,等等。

#### (五) 环境(经济)社会学: 继往开来可持续

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环境已经构成足以影响人们生活幸福与否的一支有力的掣肘性力量。环境(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幸福研究侧重于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性(如生态保护),强调环境保护过程中经济组织、社区组织与政府的共同努力,凸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意识对于幸福生活实现的重要意义。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黄有光先生(Ng, 2008)倡导的“娥妮”(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 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简称 ERHNI)研究。“娥妮”=平均净快乐年数-人均环保危害。黄教授认为,从每年度国家成功指标考核角度而言,为了考察一国经济行为对他国环境现在与将来可能造成的影响,非常有必要从每个国家的平均净快乐年数中扣除该国的人均环保(对他国与将来的)危害,这样才能得出该国当年的“娥妮”指数。而由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F, 2004)开展的“快乐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 简称 HPI)研究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  $HPI = \text{一国平均幸福年数} / \text{人均生态足迹}(\text{the per capita ecological footprint})$ 。

在国际学界新一轮幸福研究高潮中,扮演推波助澜角色的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在其幸福研究中指出,可持续性回应的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挑战,关系着子孙后代能否延续目前的幸福水平。测量可持续性至少需要弄清影响未来幸福不同因素在量上的变化。可持续发展环境因素的测度应是具有独立性的跟进。不同的是,可持续性要求几种“储备”同时保留或者增加,比如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等。为此,需要跟进基于一组精选的物理指标,特别是需要一种可以测量对环境破坏达到危险程度的精确指标。简而言之,从生产到幸福的转向离不开“可持续发展测量的务实路径与环境压力物理指标测定”的实施。

综上,影响幸福的自变量大致可以分为主客观两个维度(Diener et al., 1999),其中,客观性因素有: 1. 个体性因素——性别、收入、年龄、教育、职业、婚姻状况、信仰、健康状况、智力等; 2. 制度性因素——总体环境、民主状况、集权或分权; 3. 集体性因素——国民人均收入、

通货膨胀、失业率、邻里关系、社会宽容度、向上流动的机会等。主观性因素有：遗传基因差异、性格特质、认知特性，以及个体的其他心理过程（如目标及适应力等）。

### 三、幸福的层级性：以个体幸福感与国民幸福指数为例

基于前述学科分野的幸福观比照已看出“幸福”具有多层次特征，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如主观幸福与客观幸福、主观幸福与心理幸福等。不同层面的幸福受不同影响因素的制约，应由不同的指标去测定。弗雷和斯塔特勒(Frey & Stutzer 2002b)认为，要更好地进行幸福测量不妨依据研究对象、研究单位和研究路径的不同，将幸福概念拆分成幸福指数和幸福感两大范畴。

个体幸福感是一种强调个体知觉与感官的体验，指的是经由感觉器官感知，客观事物在人脑中得以直接反映出来用于衡量个人感受具体程度的（积极与消极）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与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生活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前述的主观幸福、客观幸福以及心理幸福都可视为个体幸福感的范畴。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幸福研究主要侧重于主客观幸福的划分。主观幸福起初是心理学的专用术语，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认知性和情感性的整体评价，其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三个不同维度组成。主观幸福具有三方面特点：（1）主观性，以评价者内定的标准而非他人的标准来评估；（2）稳定性，测量的是个体长期而非短期的情绪反应和生活满意度；（3）整体性，它是一个综合评价的指标，包括情绪反应的评估和认知判断(Diener, 1984)。客观幸福是依据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普利迪教授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沃森教授编撰的《疾病负担与生活质量测量手册》(*Handbook of Disease Burdens and Quality of Life Measures*) (Preedy & Watson 2005: 12)一书中的介绍，主要关注人们所拥有的东西（如取得资源和机会等），这些东西组成了人们可以过上好生活的客观要件。至于主观幸福、客观幸福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国外有学者(Gasper 2005)将其标示为“三角难题”，如图2所示。

图2a表明，经济因素（主要是收入）会影响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但二者同时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且彼此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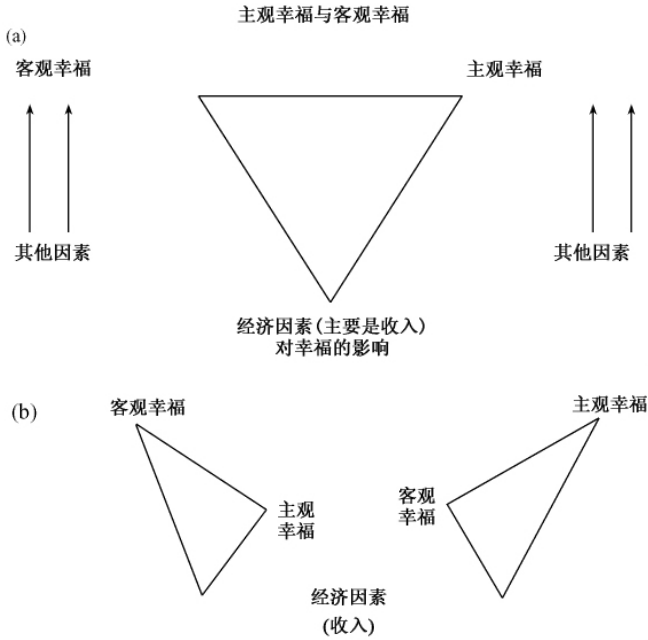


图 2 “主客观”幸福构建关系图

图 2b 表明 经济因素会影响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左图显示主观幸福作为影响客观幸福经济因素的中间变量,右图则反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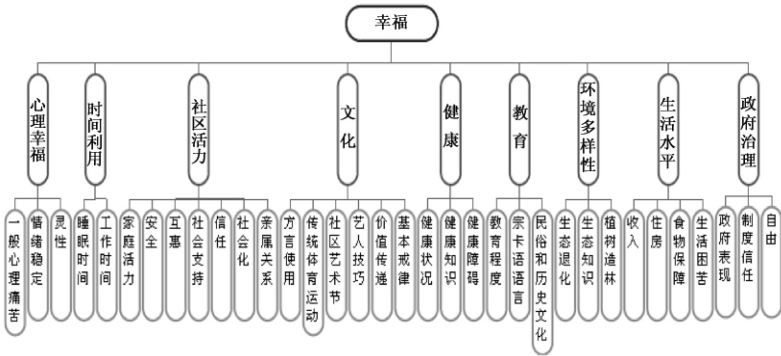
此外,关于个体幸福感的主客观层面划分还有一种理解,即由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 1999 年提出的客观幸福与体验效用,不过其“客观幸福”术语用的是“Objective Happiness”,而不是前述的 OWB。丹尼尔·卡尼曼认为,客观幸福对应于即刻效用 (instant utility),是一个“基于当期的”(moment-based)的概念,描述的是个体在某一时段的即时感觉。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happiness)的显著不同在于,客观幸福通过对精确瞬间的情感状态的及时测度而成为可用指标。主观幸福感对应于记忆效用,是“一个基于回忆的”概念,描述的是个体对过去一段时间的情绪反应和生活评价(Kahneman, 1999)。卡尼曼的这种划分受到不少研究者的支持,如安娜·亚历山德罗(Alexandrovar 2005)即认为,客观幸福是接近幸福的第一步,但并不是幸福的全部。在某些条件下,客观幸福可以作为测量主观幸福的正确途径,但具体是什么条件则是个复杂问题。

“幸福指数”是“幸福学”(Hedonics)<sup>①</sup>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幸福)快乐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一般指的是运用较为客观的事实(如失业率、健康与教育、医保住房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数据),并将其按照一定比例权重去计算,得出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或快乐与否的指数及其组合,从而对人们内心幸福快乐与否的体验予以描述记录,其所得赋值一般不是直接从个体感受而来。幸福指数研究有助于评估政策实现的成效,有助于凸显政府有可能做出的制度性变更,为政策评估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通过对比相关政策实施前后民众幸福感的变化,可以评价公共政策实现的成效如何,还有哪些需要改进。当今世界,从政府层面最早也是最有成效地开展“幸福指数”工作,至上而下地以幸福社会建设作为基本国策的国家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发达国家”或所谓的“先进国家”,而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蕞尔小国——位于喜马拉雅山麓、中印之间有着浓厚佛教信仰氛围的不丹国。不丹制定的幸福指数名称为“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sup>②</sup>。“国民幸福总值”幸福指数包含四大类,即稳健均衡的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善治、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等。具体而言,GNH涵盖9类一级指标,即心理幸福、健康、生活水平、教育、时间利用、社区活力、弹性且多样性文化、政府治理、弹性且多样性生态等,这9类一级指标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二、三、四级指标,共计可以操作化为72项具体指标,详见图3。

实际上,GNH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幸福测量指数,而且是一个体系,其注重价值、政策执行及指标之间的平衡。除了可以反映既定价值理念之外,GNH还可以用于设定政策基准线以及对政策进行追踪调研和

① 以笔者所知,“幸福学”一说始自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兼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Hsee et al., 2003)的“国民幸福计算指数”学说。

② “GNH”这一术语在国内的译名有多种版本,如“国民幸福指数”、“总国民快乐”等。本文作者与专事GNH研究的“不丹研究中心”有过多次书信往来,认为译作“国民幸福总值”较为恰当。GNH的背景介绍:1972年,不丹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质疑当时流行的仅依赖GDP即可以实现社会幸福快乐的发展观,提出了以GNH作为衡量不丹国发展进步的建言。在他执政期间,GNH得以细化完备和贯彻落实。现在位的不丹五世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秉承其父的GNH比GDP更重要的理念,认为民众幸福是社会良性发展的特征,政府治理的终极目的是实现民众的快乐与幸福。他宣告GNH的贯彻落实是不丹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方向所在,立志将不丹建设成为一个GNH国家。GNH调研主要由“不丹研究中心”承担,该中心1999年由不丹内阁(不丹最高行政执行机构)推动设立,研究中心现负责人为卡玛·尤拉理事长。



资料来源 “康复与环变背景下的 GNH 报告”,即不丹研究中心的卡玛·尤拉理 事长于2009年9月7-11日在不丹首都廷布举办的“第七届传统亚洲医药国际大会”上的发言稿。

图3 GNH 指标建构示意图

评估等。在不丹国,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和项目可以依据 GNH 领域中的心理幸福、健康、文化、生态、社区活力等关键要素予以检测及筛选,经过筛查,可以摒弃对 GNH 造成负面影响的政策项目,并选择有助于贯彻 GNH 理念的政策项目,从而得以对政策项目的选择和次序优先予以确定。因此,GNH 还可以用作为一种较好的政策项目评价与筛选工具。<sup>①</sup>同时,作为政策及项目筛选工具,GNH 强调公共讨论、公共审议及舆情对于界定包括 GNH 自身在内的任何发展目标的裨益性,而这一切都将有助于政府政策合法性的生成与巩固。

通过 GNH 等国民幸福指数的使用我们发现,从政策导出角度审视国民幸福指数的功用大致有: 1. 微观个体幸福感的测量可以用于评估

① GNH 筛查工具包含项目层次和政策层次,服务的机构包括: 1. 服务于所有部委(如善治); 2. 服务于各自不同的部委(如教育、卫生); 3. 服务于个别机构(如青年工作、求职就业)。整个操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政策项目筛查、计算与打分。具体的评审筛选工作由“GNH 规划委员会”负责组织。供筛选的政策项目均用四分量表评价,其分值标示着从负面到正面的变化,其中,“1”代表负分值,“2”代表不确定,“3”代表中性分值,“4”代表正分值。原则上,需检测政策项目的整体得分不能低于中间值,如果未达标,则该政策项目就需要加以修正或摒弃。评价者由不同行业人员(如学者、官员、监察人员以及普通公众等)组成,以有利于多元背景者共识的达成。关于 GNH 的更多阐述,请参阅 丘海雄、李敢 2011。

政府财政支出的成效。2. 提高就业率的做法比仅仅增加人均收入或提供失业救济金的做法更有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3. 对“贫困人群”的定义应同时测量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和主观幸福感的强弱。4. 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受到与他人比较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考虑向高收入人群收更高的税,以增加社会阶层之间的平等性(但仍需考虑其他很多方面的影响)。5. 政策制定应回归个体的“偏好”和“需求”。以前的政策制定往往只考虑如何改善社会经济环境,忽视了个体偏好和需求的变化。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认为个体的行为决定是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然而现有的研究发现社会比较和快乐适应性并不一定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经济学前提假设的解释力。因此,政府政策的关注点应回归到个体的偏好和需求上。6. 加快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不仅需要为低收入家庭作更多的政策倾斜,中等收入水平的个体在应对市场风险时同样显得脆弱,也会出现向下流动的结果。这种期望与现实的差距以及以前与现在的地位落差使他们更容易感到生活的不幸。7. 关注某一地区在其特定发展阶段不同人群在幸福感知方面的差异性,并根据这种差异性在政策制定方面予以调整,以求其政策导向设置更加合情合理(Frey & Stutzer, 2002b; Easterlin, 2003; Graham, 2005b; Bork, 2010)。一言以蔽之,针对一国一地发展阶段与其特质而设置的相应国民幸福指数及其运用,有助于捕捉、追踪与测度民众幸福程度变化,如发现影响幸福提升因子的权重序列及其结构的演化,并协助政府开发出可以促进民众幸福度提升的公共政策,从而弥补既有GDP核算体系的不足。

综上,从测量角度考察幸福的层级性可以发现,(偏于理论导向的)个体幸福感测量与(偏于政策导向)国民幸福指数测量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依托于对个人(生活状况)满意度的主观调查去分析其对国家状况的满意度,强调的是从个体本身出发研究他们自身的需求和满足,其测量过程中涉及的层面一般较为简单(如盖勒普幸福感调查、皮尤幸福感调查,以及世界价值观等大样本问卷调查均采用单一问题的调查法),且在多数情况下无意于影响政策决策及执行,这个层面幸福状况的改善与提升一般是借助于个体的心理调适以及适应性行为的校正等途径。相较而言,GNH等国民幸福指数从事的幸福测量则多属于从国家(政府)治理层面出发,以求让政府更多地关注那些令人们觉得不幸福的领域,并以此作为政策变更的着力点与突破点,进而确定哪些

政策领域的问题是急需解决的,哪些领域的问题可稍后解决,以求在公共领域层面更好实现“先后有顺、循序渐进、优化生活”的目标。这类调查通常更着眼于政策规划、政策影响评估和绩效评估等层面,其幸福评估一般需要同时考虑个人满意度和公共政策满意度,兼顾主观调查数据分析与客观调查数据分析,并可以为社会福利测度提供更为准确的衡量标准,因而有助于政府做出更适宜的公共决策,并据此确定用于实现最大化国民幸福所需要采取的有关行为措施与方法途径。因而,这个层面幸福状况的改善与提升一般是诉诸于政府公共政策层次,可以经由追加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公共开支加以实现,例如资源(机会、规则、权利等)的公正配置、职业发展、民意表达与善治的达致,教育、健康与安全的保障,以及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的并行不悖、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发展理念之贯彻落实等等。

#### 四、发展趋势变迁:从“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到“国民幸福帐户”体系

除了“多层次性”这一特征外,从前述基于学科分野的幸福观的若干比照可以发现,“幸福”具有复杂性特征,应当看到,对幸福的感知可能同时受制于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的交互作用,这一过程既非纯心理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又非纯精神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当然也不只是社会实践因素(经济、社会与文化等)作用的结果。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相关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因果关系。例如,现在有关“婚姻—幸福”的实证研究大都表明已婚族比未婚族(离异族)更幸福,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可能是幸福的人更易选择婚姻生活。参比“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即SNA体系,借用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F 2004)及卡尼曼(Kahneman 2004a)提出的“国民幸福帐户”(National Accounts of Wellbeing或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s)概念,本文将上述影响幸福的诸因素予以“资本”概念化,如图4所示。

在笔者看来,幸福议题的本质依然从属于人类更好探求自身合宜发展模式的范畴,随着各国政府对发展认识的深化,发展将由注重经济绩效走向注重全面社会进步,由专注于经济域的国民经济帐户体系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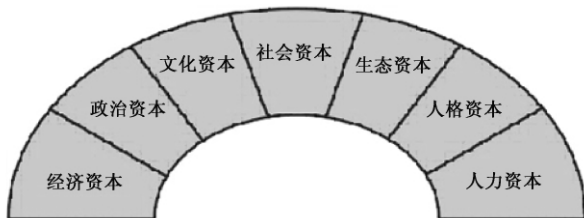


图4 “资本论”视域下的幸福帐户

代走向兼顾社会域的“国民幸福帐户”时代可能演化为一种新的客观趋势。美国学者德里克·波克 (Bork 2010: 23-25) 的研究发现,人们感觉幸福并不仅源于对快乐的体验和凡事争第一的感觉,更为重要的是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因此,对幸福的追求不仅是个体自利的表现,而且是关系到我们是否拥有一个更为强大、美好和安全的社会。基于这样的认识,英、美、法等欧美发达国家逐步将幸福研究融入到政府决策考虑的范围之内。法国政府将能够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纳入评价国家幸福感体系;英国的保守党主席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宣称,政府需要解决的绝不是如何将金钱放入人们的口袋,而是如何将幸福深入人心。

各国政府通过幸福感研究,有助于了解人们在各领域的幸福感受,有助于他们根据个体的需求做出更为科学、客观的政策制定和调整。易言之,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贯彻落实而言,幸福探寻对于政府的要义在于倡导与力行“经济与社会”的共建发展观,即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兼顾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公民权利的甄善与政府责任的甄善等诉求。或正如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颁布的《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委员会报告》(Stiglitz et al., 2009)中所言,在公共政策层面,实现“评价系统的重点由经济产出向民众幸福转变”将是考量未来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一种客观趋势所在,也将构成政府执行力新的挑战与动力。各国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价方面推崇GDP/GNP至上的发展观已经主导世界六七十年,时至今日,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测量体系方面,有必要也应当努力逐步实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转变了。倡行经济政策与幸福政策并举已经成为时代性的潮流,为民众谋幸福已经成为政府无法回避的责任所在。



## 参考文献:

- 方纲、风笑天 2009,《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研究述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加尔布雷克斯,1965,《丰裕社会》,徐世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娄伶俐 2010,《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丘海雄、李敢 2011,《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镜鉴:源自不丹和法国》,《改革》第6期。
- 赛利格曼 2010,《真实的幸福》,洪兰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 Alexandrovar, Anna 2005,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Kahneman’s ‘Objective Happines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6.
- Bork, Derek 2010,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What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the New Research on Well-being*. Jersey: New Jersey University Press.
- Csikszentmihalyi, M. & R. W. Larson 1987,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5.
- Diener, E. 1984,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y Bulletin* 95(3).
- 1995, “Resources, Personal Striving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Nomothetic and Idiographic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
- Diener, E., M. Suh, E. Lucas & H. Smith 1999,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2).
- Easterlin, Richard 2003, “Explaining Happ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0: 19, September 16.
- Frey, Bruno S. & Alois Stutzer 2002a, *Happiness and Economics: 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Human Well-being*.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2b,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7(XL).
- Gasper, Des 2005,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ell-Being in Relation to Economic Inputs: Puzzles and Responses.”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63(2).
- Graham, C. 2005a,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 Forthcoming in Steven Durlauf & Larry Blume (ed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nd Edition*. Economic Studies Program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2005b, “Insights on Development from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2).
- Graham C., A. Eggers & S. Sukhtankar 2004, “Does Happiness Pay?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Russi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55.
- Hsee, C. K., F. Yu, J. Zhang & Y. Zhang 2003, “Medium Maximiz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0.
- Inglehart Ronald, Roberto Foa, Christopher Peterson & Christian Welzel 2008, “Development, Freedom, and Rising Happiness, A Global Perspective (1981–2007).”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
- Kahneman, D. 1997, “Back to Bentham? Explorations of Experienced Utility.” *Quarterly Journal*

- of *Economics* 112(2) .
- 1999, “ ‘Objective Happiness’ in Kahneman , Diener and Schwarz. ” *Psychological Science* 4.
- 2000, “Experienced Utility and Objective Happiness: A Moment-based Approach. ” In D. Kahneman & A. Tversky( eds. ) , *Choices , Values and Fra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2004a, “Toward 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2) .
- 2004b, “A 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 *Science* 306(5702) .
- Larson , R. & M. Csikszentmihalyi 1983, “Th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 *New Directions for Methodology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15.
-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004 , *A Well-being Manifesto for a Flourishing Society*. London: NEF.
- Ng , Yew-Kwang 1996, “Happiness Surveys: Some Comparability Issues and An Exploratory Survey Based on Just Perceivable Increments. ”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8.
- 2008,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ly Acceptable National Success. ”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5.
- O'Neill , John 2006, “Sustainability , Well-being and Consumption: The Limits of Hedonic Approaches. ”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22.
- Powdthavee , N. 2007, “Putting a Price Tag on Friends , Relatives , and Neighbours: Using Surveys of Life Satisfaction to Value Social Relationships. ” *Forthcoming in Chulalongkorn Journal of Economics* 18(1) .
- Preedy , Victor R. & Ronald R. Watson ( eds. ) 2009 , *Handbook of Disease Burdens and Quality of Life Measure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Inc.
- Ryff , C. D. 1989,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 or Is It? Explorations on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57(6) .
- Sen , A. 1995, “Rationality and Social Choice.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
- Stiglitz Joseph , Amartya Sen & Jean-Paul Fitoussi 2009,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Revisited—Reflections and Overview. ”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 Thaler , R. H. 1980, “Towards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
- 1999, “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 ”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2(3) .
- Young Foundation 2010a , *Taking the Temperature of Local Communities: The Wellbeing and Resilience Measure-WARM*. London: Young Foundation.
- 2010b , *Neighbourliness + Empowerment = Wellbeing Is There A Formula for Happy Communities?* London: Young Foundation.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责任编辑: 张志敏

spot sense only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 , who never regarded it as “historical ethnography”; the real ethnography requires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and has substantial ethical issues.

## **REVIEW**

The Ambition and Myth of Neo-Classical Sociology: A critical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son on multiple transition consequences

..... *Lv Peng* 204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history and recent development of “neo-classical sociology” proposed by Ivan Szelenyi ,is to provide an analytical approach for comparing various consequences of market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Facing a complicated scenario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the author propose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based on macro-logic and micro-mechanism. On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 explanatory powers of three independent yet related macro logics ,i. e. , industrialization , globalization ,and tran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micro-mechanisms underlying those macro-logics could be revealed by analyzing strategies of agents.

A Review of Studies on Well-being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

..... *Qiu Haixiong & Li Gan* 224

**Abstract:** Recently various subjects such as economics ,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well-being( “happiness”) . However , there are also lots of discrepancies amo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approaches of different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 various subjec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well-being definitions in different subjects and tries to identify the hierarchy and complexity of well-being ( such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dividual well-being and national well-being index) . The authors finally propose their own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ell-being studies , which is from focusing on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 System” to “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 System” .